

韩晓明,胡晓飞,乔凤杰.“象形取意”:中国武术的思维方式与运行逻辑[J].体育学研究,2021,35(2):92-98.

“象形取意”:中国武术的思维方式与运行逻辑

韩晓明¹,胡晓飞²,乔凤杰¹

(1.清华大学 体育部,北京 100084;2.北京体育大学 中国武术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象形取意”思维方式的诠释既是对中国武术文化的追本溯源,也是对其内在特质的哲学性反思。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探究中国武术“象形取意”思维方式的文化内涵与运行逻辑。研究认为,中国武术中“象形取意”既是“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方式,也是“知行合一”的直觉性“体认”过程。其运行逻辑是以“观物取象”为逻辑原点,以“立象尽意”为汇通纽带,以“得意忘象”为终极诉求的前后相续、彼此衔接的完整过程。中国武术内蕴的“象形取意”思维方式对动作命名、拳种形成、技法革新、风格演变、文化创造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象形取意;中国武术;思维方式;文化内涵;运行逻辑

【中图分类号】:G8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656(2021)02-0092-07

DOI:10.15877/j.cnki.nsic.20210330.002

“象形取意”作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内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易学“仰观俯察,近取远取”、道家“寻言以观象,寻象以观意”、儒家“盈天下而皆象也”等均是典型代表。中国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动作的命名、拳种的形成、技法的革新、风格的演变、文化的创造等,几乎均是在“象形取意”思维方式的“归引”下进行的,即中国武术“象形取意”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基于习武者“为我所用”的基本理念,通过观察、模仿动物、人、自然现象、再现创造性的思维(如神话传说)以及特殊场景等,获得独具特色的“形”,体会、揣摩、想象“形”所蕴含的内在之“意”,并对“象的形”“取的意”进行加工、提炼等,进而获得习练中国武术所需的方法、规律、观念,传达习武者的精神、思想与情感,由此中国武术形成了深邃的文化底蕴和内隐的基本特质。在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景下,理应对中国武术内蕴的“象形取意”思维方式仔细探索。鉴于此,本研究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阐释中国武术中“象形取意”思维方式的内涵,厘清“象形取意”在习武者体化实践过程中的运行

逻辑,以此回归中国武术的“原创之思”——“象形取意”,进而重塑中国武术文化之内在特质。

1 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象形取意”

一个民族的特殊品格,乃是由其文化塑造的;而民族文化的特殊品格,则与其思维方式的特性直接相关^[1]。“象形取意”作为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不仅是中国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式,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已的“文化基因”,即中国古人习惯于通过效法自然、模仿自然的实践活动,体会、揣摩、想象其中的内在之意与价值,获取有用的实践知识、经验或灵感,进而对相应的技术革新、思想创新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对“象形取意”这一独具中国特色思维方式的挖掘,使我们认识到中国武术不论是从纵向维度还是横向维度,均呈现出“渊源之长、应用之广、根植

收稿日期:2021-01-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6BTY022)。

作者简介:韩晓明(1990—),男,河北正定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武术哲学。

通信作者:乔凤杰(1969—),男,河南安阳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武术哲学。

之深”的基本特性,以及“举他物以明之”与“置心在物中”的思维方式。因此,中国人倾向于以“象形取意”的思维方式去感知、了解和认识事物的发生、发展与演变规律,洞悉其内在的意蕴,从而细微无声地勾勒成为一种“日用而不觉,外显而不察”的民族性思维方式,为中华民族认识、感悟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工具。“象形取意”体现在中国武术中“白鹤亮翅”“黑虎掏心”“金鸡独立”等动作命名,螳螂拳手法中“勾、搂、挂、刁、缠、劈”等攻防技法,“虎形拳”“螳螂拳”“鹰爪拳”等拳种形成,以及“刀如下山猛虎,剑似翻海蛟龙”的风格特征等。

2 中国武术中“象形取意”思维方式的文化内涵

一般来说,文化的延续性和生命力在思维方式面前会稍显逊色,尤其表层的文化更是随着人们的特定需要而产生,又随时代以及相应的需求变化逐渐消逝;而思维方式一旦形成,为社会所接受,就会积存于人的心理底层,转化为一种“集体意识”,甚至是“集体无意识”,自觉或不自觉支配与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方式^[2]。它不会随个体的消逝而消失,亦不随时代的变化亦步亦趋。“象形取意”作为中国传统基源性思维方式,根植于中国武术文化的最深层,是中国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武术文化的建构具有支配、导向甚至是底层控制的重要功能。因此,对中国武术文化的探究需要深入到“象形取意”的思维方式领域。

2.1 中国武术中“象形取意”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方式

总体而言,思维的整体性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根本的特征。所谓整体性,即从整体出发,把对象及其所处的环境当作完全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加以对待,对其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的省察、体验,注重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进而理解和规定对象^[3]。在“万物一体”的整体性观念中,最根本、最典型的代表当属“天人合一”^[4],它是将人与自然统一起来,把二者视为统一的整体。从老子《道德经》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到庄子《齐物论》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再到孟子《孟子·尽心上》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以及张载《张子语录》的“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无不是在谈论

“天人合一”。中国武术“象形取意”的思维方式是对“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践行,大自然中的飞禽走兽、山川湖泊无疑对中国武术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大自然中飞禽走兽的形态、姿势、动作、攻防技能等,为中国武术动作的命名、拳种的形成、技法的革新、风格的演变提供了灵感来源和创作素材。如“大鹏展翅”“野马分鬃”“苍鹰掐喉”等动作名称,“虎形拳”“鸭形拳”“白鹤拳”等象形拳,“咏春拳”中的“二字钳羊马”“十字蛇形手”、螳螂拳手法中的“勾、搂、挂、刁、缠、劈”、六合拳中的“踩鸡步”“鹰捉把”“虎抱头”等技法^[5],以及“猿猴通背拳、鹰爪翻子拳、游龙八卦掌”等风格特征,如此等等。中国武术的习练强调“师法自然”,即习武者将自身置于大自然之中,以螳螂为师、以猿猴为友、以白鹤为伴,通过观察、模仿飞禽走兽在捕食、争斗、御敌、逃遁过程中的闪转腾挪、攻防格斗以及手眼身法步等,体会、揣摩其中的内在含义和价值,即在“象其外形,取其内意,形似意真”的基础上经过系统化加工、凝练和升华,进而逐渐形成了“为我所用”的中国武术攻防技击的方法、原则、观念。

另一方面,大自然中水、山等物质所呈现的自然现象,也为中国武术的技法革新、文化创造提供了源头活水。正所谓:“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从“水无常形”的特性,中国武术的实践者感悟到了“拳无常势”,即拳势应如水势一样,须处于“刚与柔、蓄与发、曲与伸、虚与实、动与静、升与降、缓与急”的变化之中,在此基础上,太极拳逐渐产生和形成了“以柔克刚、蓄势而发、随曲就伸、避实击虚、以静制动、舍己从人、动急则急应,动缓则缓随”等技法。从“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品性,习武者感悟到了中国武术的体化实践更需要追求“与人为善、处柔守弱、君子之争”的中庸处世之道,以及“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人生境界。从“山崩地裂”之势,习武者领悟到了形意拳中崩拳发力应如山摇地动、炮拳如山崩地裂、劈拳如力劈华山,八极拳中的崩劲如山崩之势、撼劲如震撼山岳,以及少林镇山拳中“发拳有穿山洞石之情,落步有入地生根之意”等技法。从山的“威严耸立”之态,感悟到了八卦掌的“桩如山岳,步似水中”,太极拳的“静如山岳,动若江河”,华拳的“进如风雨,退若山岳”^[6],同时还需要

塑造“刚正不阿、不屈不挠、沉着稳重”的坚毅品格,以及“泰然处世、宽容仁厚、包容万物”的崇高德性。正如孙禄堂所言:“拳意之道,大概皆是河洛之理。以之取象命名,数理兼该,顺其人之动作之自然,制成法则,而人身体力行之。”^[7]中国武术把作为审美对象的水、山、风、雨等自然景物和现象看作是技法精妙和品德高尚的象征,即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以此来求得物我、内外的合一。

中国武术“象形取意”的思维方式就是习武者通过观察、模仿大自然中飞禽走兽、山川湖泊等自然之形,体会、揣摩与想象其内在意蕴,进而获得较为完整的实践经验、灵感或知识,以此实现与自然相融、相通、相应。由于“象形”是以相互关联的统一整体为对象,故此通过“取意”所形成的中国武术,表征的并非中国武术的某个部分,而是系统的、全息式的中国武术之整体。“象形取意”这种“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方式表达了中国武术取法自然、效法自然,即将自然之形与自然之意寓于拳法之中的内在逻辑,对中国武术的动作命名、拳种形成、技法革新以及文化创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2 中国武术中“象形取意”是一种“知行合一”的直觉性“体认”过程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对客观世界的把握往往是直觉的或直观的。所谓直觉性,是指不经过严密的逻辑分析,直接从对形的感观到对意的把握的思维活动,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理体验和认知活动^[8]。“知行合一”是“知”与“行”两面的“一时并到”与“一体呈现”,具体表现为一种直觉性的“体认”与“意会”^[9]。其中,儒家“体认天理”;佛家“顿悟成佛”;道家“与道合一”;玄学家王弼提出“体无”即直觉,认为“无”超言绝象,故圣人“不以言为主,不以名为常”,而须以“体认”直接把握之;理学家朱熹解释“体天下之物”的“体”为“此是置心在物中,穷见其理”,即强调内心体验。这些均表明中国传统哲学注重直觉性“体认”的致思倾向。

这种注重实践、“体认”“知行合一”的思想,在中国武术“象形取意”中则表现为不论是“象其形”抑或“取其意”,习武者并不是通过“坐而论道”的说教、“竭尽心知”的认识,而是在于“身体力行”的训练以及“事必躬亲”的体悟,同时强调取得的形与意要切合实用,并对其进行加工、提炼以形成独具个人

特质的技法,然后再运用于实践,由此形成了中国武术“象形取意”的基本脉络。拳谚中的“拳练千遍,其义自见”“口说千遍,不如自练一遍”“三年小成,五年中成,十年大成”等,都是在强调不懈的“体认”在武术修炼过程中的重要性^[10]。“体认”不同于知识,它属于自我专有的经验,无法用概念表达,也无法原原本本告诉别人,他人想获得这种经验,需要自己亲身的体验。正如冯友兰所言:“‘体认’就是由体验而得来的认识,这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一种经验、一种直觉,不是一种理智的知识”^[11]。习武者对自然万物的观察、模仿、体验、感悟,均是“体认”的直观表现形式。如在虎拳中,习武者体察、模仿老虎刚健威猛的姿态和猛虎扑食、蹿蹦跳跃的动作需要体认,体验和感悟老虎“抓、摆、撩、搂、按、压”的手法和“吞、吐、浮、沉”的身法也需要体认,达到“形、神、意、气”的完整合一更需要体认。在中国武术的修炼过程中,习武者通过身体力行的反复实践,对天地万物的形与神不断地“屡践”“亲证”“自得”,并在体认过程中直接感悟、了悟甚至是顿悟其中的核心要义,做到“外化于形、内化于心、以身释意”,进而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由此可知,直觉性“体认”是创立象形拳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如果习武者只是观察、认识动物的行为方式,而没有对其内蕴的攻防含义“躬身屡践”,即缺失了在“行”中的练、悟、用^[12],也就不会获得精微奥妙之意与理,更不可能形成如此繁花锦簇的象形拳,所谓“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13]。

中国武术“象形取意”的思维方式是习武者设身处地,体物入微,不断的体验、体会、体认自然万物的基础,再通过个体化实践体现和表达自身对自然万物的认识,进而达到并把握“知”与“行”的合一,顿悟本心仁本。故此,这一系列的直觉性“体认”过程既为习武者直观的感受、感悟世界创造了实践基础,也为中国武术的形成、发展和创新提供了可操作性工具,最终将中国武术塑造成为超越感性,但又没有脱离感性的独具东方魅力的身体文化^[14]。

3 中国武术中“象形取意”思维方式的运行逻辑

中国武术中“象形取意”思维方式是中国哲学思想的形象体现,它是以“观物取象”为逻辑起点,以“立象尽意”为会通纽带,以“得意忘象”为终极诉

求的前后相继、彼此衔接的完整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其一,“象形取意”中的“象”为动词,即模仿或模拟。其二,“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和“得意忘象”中的“象”均为名词,既指自然万物之具体“形象”,也指经过模拟而转化的“抽象”符号,如阴阳“图象”、五行“类象”和八卦“卦象”。而“意”则是“象”(名词)所蕴含的内在含义,是思想情感、人生体验、价值追求、精神之意志。因此,“象”是沟通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中介,上通形而上之“意”,下达形而下之“物”^[15]。

3.1 “观物取象”:中国武术中“象形取意”的逻辑起点

观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逻辑起点,而定性的识别性观察则是中国古人独特的哲学思维方式^[16]。在“观物取象”过程中,“观物”是“取象”的基础和前提,“取象”是“观物”的直接结果,是对“观物”过程中所获取的关于对象的感受和表象的进一步概括和凝练,是使客体对象主体化的过程。其中,“观”是对自然万物的直接观察和感受;“物”指动物、人、自然现象、再现创造性思维(如神话传说)以及特殊场景等;“取”是在“观”的基础上结合自我主观意识进行的加工、提炼、创造;“象”则是“物”的具体形象、抽象符号。

“观物取象”是“象形取意”的逻辑起点,是中国武术形成与发展的实践基础。习武者通过“心穷万物之源,目尽山川之势”^[17],对“见于外”的自然万物进行观察和模仿,将“物”所表达的功能与意象相联系,建立独具特色的“象”,然后与中国武术相结合,阐述中国武术隐于内的“意”与“理”。就“观物取象”中不同“物”的角度而言,习武者观察和模仿动物的形态、动作、神态的典型代表当属象形拳^[18],如虎拳、豹拳、金狮拳、猴拳、蛇拳、鹰爪拳、鸡形拳、鸭形拳等(真实存在的动物),以及龙形拳、青龙拳、麒麟拳等(想象中的动物)。观察和模仿人物特征的有醉拳、孙膑拳、太祖拳(真实存在的人物),宋江拳、燕青拳、武松脱铐拳、鲁智深醉跌拳(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以及醉八仙拳、哪吒拳、观音拳(神话传说中的人物)。通过体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季节性变化,形意拳形成了与四时相配的练拳特点,即“春季练内气和内劲,走势宜悠,发劲宜柔;夏季宜发放劲力;秋季则少发暴力,内收劲力;冬季应深藏劲力,

不可急发暴力”。通过体察南北方的地域性差异,中国武术形成了以“南拳北腿”为典型代表的风格特征。北方地域辽阔,骏马秋风大漠是北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北方武术风格呈现舒展大方、闪转腾挪、长于腿法,素有“拳打四方”的说法;南方丘陵交错、水网纵横,以杏花春雨江南闻名于耳,南方武术风格则呈现短小精悍、硬桥硬马、手法居多,以“拳打卧牛之地”闻名于世。同时,山川树木、星辰大海、行云流水等自然现象以及某些特定的社会现象等都是中国武术“象形取意”的所观之“物”,这对于塑造千姿百态、繁花似锦的中国武术提供了创造灵感。

基于“无大不极,无微不穷”的易学理念,习武者既观鸟兽草木之细物、也察山水天地之大物,并细致入微地体察四时变化和地域性差异,才有了中国武术琳琅满目的拳种和流派,以及独具特色的练习方法和风格特征。此外,中国武术中的“观物取象”不是对其外形的照搬或模仿,而是通过外在之形体悟蕴藏其中的内在之意,进而为“立象尽意”提供客观条件。

3.2 “立象尽意”:中国武术中“象形取意”的会通纽带

“立象尽意”是中国哲学的言说传统^[19]。从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可知,“书”与“言”、“言”与“意”之间表现为矛盾统一的关系^[20]。一方面,书是表层的、直观的文字符号,书是为了尽言,但又不能完全表达言的内容;另一方面,言是具体的、感性的,而意有深远委曲,常蕴藏在事物内部,是无形的、多义的、深奥的,故言也不能完全表达意,正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21]。因此,通过“象”来表达微妙不可言传的“意”。“象”之所以能“尽意”,是在于“象”消解了“言”的形式化和规范化倾向,并不试图以某种形式与秩序规范“意”,而是在其提供的自由空间内使“意”自由生长,体现出“意”的灵活性、无限性和生生之趣,故“象”能与“意”相融汇。

中国武术“象形取意”的过程中,习武者不仅要观察和模仿“物”,取其具体“形象”或“抽象”符号,还需要进一步体会、揣摩、想象、加工“象”背后所蕴含的内在之“意”,进而获得习练武术所需要的方法、规律、观念等,传达习武者的思想与情感^[22]。其中,醉拳讲究“似醉非醉,形醉意不醉,步醉心不醉”,习练者以醉汉跌撞摇摆、东倒西歪、前俯后仰、

踉踉跄跄之“形象”体悟其顺势应变、以倒取势、放荡不羁、如痴如醉之“意”。同时,醉形、醉态之中暗藏着虚守实发、逢击而避、乘隙而入、指东打西等技法,表达了习武者将酒入拳意、以拳寓酒风,拳不离醉意、醉意不离拳的创拳思路,以及对“醉美”风格的追寻。鹰爪拳则以鹰的捕食、爪抓、展翅、盘旋之形象体悟其抓扣掐拿、上下翻转、连环快速之“意”。在鹰爪抓拿和鹰翼翻旋之中蕴含着出手崩打、回手抓拿、分筋错骨、点穴闭气、翻转灵活等技法,给人以机智、果断、勇猛、优美之感。如果习武者仅以模仿醉汉和鹰的外在之形、追求“形似”为目的,而忽略了其内隐的攻防格斗之意,那么此拳种必然会脱离中国武术的技击本质,沦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可见,中国武术“象形取意”的过程“贵在取意”,“取意”是中国武术攻防技击意识形成和发展的灵感之源。这也表明在诸多象形拳中,除了代表其拳种风格的技法之外,鲜有单纯模仿人或动物姿势、形态的动作,即无论是踢、打、摔、拿等技法,抑或攻守进退、刚柔虚实、闪转腾挪等运动形式均是在体悟其内在之意的基础上,再结合中国武术的攻防规律,加以创编、提炼、升华而形成的。

“立象尽意”并不是象形拳的专属特性,作为内家拳的太极拳和形意拳,也体现了“立象尽意”的思维方式。其一,太极拳以阴阳、八卦和五行的中国传统哲学之“抽象”符号^[23]追求对其“意”的体悟,运用阴阳“图象”教以“哲拳”,其招法在刚与柔、动与静、虚与实、曲与伸、蓄与发、缓与急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对立统一;通过八卦“卦象”教以“八法”,棚、捋、挤、按,即坎、离、震、兑四正方也,采、捌、肘、靠,即乾、坤、艮、巽四斜角也;再通过五行“类象”教以“五步”,进、退、顾、盼、定,即金、木、水、火、土,合而言之“十三势”。故此,太极拳逐渐形成了“负阴抱阳,手打八方,脚踏五位”的基本理念,确立了“以柔克刚、后发先至、避实击虚、随曲就伸”等技法,进而感悟天地宇宙运行之理气,传达习武者对“一阴一阳谓之道”和“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宇宙万物演变规律的认识,感而遂通,以拳入道。其二,形意拳,即象其外形,取其内意,形意兼备,内外合一,乃为形意。正如拳谚所云:“心意诚于中,而万物形于外。在内为意,在外为形。”形意拳以五行之“类象”和十二形之“形象”(取动物

之外形为身法,取其之能为意)追求对内在之“意”的体悟,形成了“内与五脏合,外与五官配”的五行生克的五行拳,即劈拳(金)、崩拳(木)、钻拳(水)、炮拳(火)和横拳(土),以及龙的搜骨之法、虎的扑食之勇、猴的纵山之灵、马的疾蹄之功、鼃的浮水之能、鸡的抖翎之威、鹞的入林之巧、燕的抄水之精、蛇的拔草之能、驴的护尾之能、鹰的搜获之精、熊的竖项之力,并将12种动物之“腾、扑、灵、撞、云、抖、掠、翻、惊、活、爪、猛”的特长融入形意拳中,进而传达习武者“果敢无战不胜,刚毅无征不服”的坚韧意志,以及内外合一之道。

“意”无“象”将无法显现,“象”无“意”则失之为空洞、肤浅。中国武术以象形为外势,以意真为内隐,将难以言尽的“内在之意”通过习武者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选择的“外在之象”来表达,以有限之象表达无限之意,并在此过程中追求一种弦外之音、味外之旨、韵外之致、象外之意^[23-24],继而达到藉形以表意、立象以尽意,融象、意为一体,中国武术中“意”与“象”的内在关系表现为一种思想与形象、情与景、内与外、质与文在特定的体化实践过程中的渗透、交融、化合。

3.3 “得意忘象”:中国武术中“象形取意”的终极诉求

“得意忘象”是对“立象尽意”的进一步发挥^[25],是超越具体“象”的限制,实现“意”之本体的回归。庄子论“意”与“象”时,强调层层递进的超越,即“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26]。其后,王弼据“贵无论”彰显作为本体的“无”与形形色色具体事物的差异,主张具体的“象”不能完全表达本体的“意”,而仅作为虽不完善却又不可替代的手段去体现“意”,如同“鱼与筌”“兔与蹄”的关系。因此,只有理解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认识到“立象以尽意”“尽意莫若象”,但又不拘泥或不执着于“象”,即从“象”出发,又能“忘象”;既要“立象”,又要超越于“象”,才能达到对本体之“意”的认识,所谓:“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27]。

尽管中国武术的拳种众多、风格各异,但对“意”与“象”(尤其是“形”)关系的认识,均有较统一的共识,即讲究以心为主宰,意为形之总领。如

“达摩西来无一字,全凭心意练功夫”“内动于心,百体从令”“意到气到,气到血行,血行则病不生”等,均说明了“意”在中国武术修炼过程中的重要作用^[28]。“得意忘象”是在获得其内蕴的以及习武者所需的“意”之后,不再苛求武术招式的娴熟,也不再执着于武术技法的精湛抑或武术理念的创新,而是一种对中国武术“形”的超越,以求达到“出神入化”的自由境界,所谓“无法而法,乃为至法”“手中无剑,剑在心中”“无招胜有招,举手投足皆是招”,进而传达习武者的精神、思想与情感,以此通向对大道的感悟。如六合螳螂拳强调“重意不重形”,即不为形式所拘,不为格式所限,要求从功架到熟练,从熟练到巧练,从巧练再到自然,最后达到自然而然,正所谓:“心意相合法自然,意气沉守在丹田,步到手到气力到,妙法用在意行间”。形意拳则强调“有意莫带形,带形必不赢”,若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处理好“意”与“形”的内在逻辑关系,即在实战过程中隐藏自我的攻防动作或意图,凭借直觉反应探知对方的意图,进而达到“人不知我,我独知人”的境界。太极拳则讲求“用意不用力”“心静用意”以及“由招熟而渐悟懂劲,由懂劲而阶及神明”等,均是“得意忘象”的典型代表,体现了习武者对超越招式和技法,追求精神世界自由的向往。

中国武术“得意”之后的“忘象”或“忘形”并不是完全摒弃“象”或“形”,而是对所得之“象”的超越,即回归“意”之本来、本真面貌,不拘泥于具体的“象”而进入更高的“意”的思想境界。这是因为“象”之功用是为了诠释中国武术的“意”,如果执迷于作为工具的“象”,那么所得的“象”并非能“表意”的“象”,即“存象而失其意”,只有分清楚“象”之工具性和“意”之目的性,才能达到真正的“得意”^[29]。正所谓:“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义苟在健,何必马乎?忘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因此,中国武术中的“象形取意”就是一种“入乎象”“出乎象”,以及“超越象”“放弃象”的层级递进、步步深入的体悟过程,进而追求一种“超言绝象”的意境^[30],以此才能达到“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此外,中国武术“得意”之后不仅需要“忘象”,还需要“忘意”,正如形意拳所言:“拳无拳,意无意,无意之中是真意”^[31]。而此处的“无意”并非完全不用意,而是介于一种勿忘无助、似有似无、绵绵若

存的状态,此时的“意”恰恰更接近于习武者内在的精神特质,使得习武者可以抛除杂念,以至“无形无相”“无内无外”“无我无他”,进而达到“内感通灵、应物自然、幻化无穷”的境界,所谓:“有心有意皆为假,练到无心方为真;不期然而然,莫知之而至”。

4 结语

“象形取意”作为中华民族认识、感悟、改造世界的“日用而不觉,外显而不察”思维方式,对于理解中国武术的发生、发展,以及中国武术文化的形成、创造具有“文化基因”意义上的推动作用。在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武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理应对中国武术内蕴的“象形取意”思维方式仔细探索,进而重塑中国武术文化之内在特质。研究发现,中国武术中“象形取意”既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方式,也是“知行合一”的直觉性“体认”过程;其内在的运行逻辑是以“观物取象”为逻辑原点,以“立象尽意”为汇通纽带,以“得意忘象”为终极诉求的系统性、整体性过程。

此外,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象形取意”思维方式、不重视分析与逻辑,给中国武术的现代化转型带来了一些障碍,中国武术与以奥林匹克为代表的西方体育的对话和沟通仍处于“汇而不通”“融而不合”的尴尬境遇。因此,以“象形取意”为代表的东方“悟性”思维和西方“理性”思维需要搭建一座汇通的桥梁,使二者在思维过程中能够达到合理平衡,弥补与传统文化的断裂,适应当今思想界重建“形而上学”的需要,使思维方式的建构更符合人类全面发展的本性。

参考文献:

- [1] 王树人.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 [2] 高晨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 [3] 范玉秋,田力.中国哲学与传统文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
- [4] 张再林.身体哲学视域下的中华武术与中华之道的合一[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9,42(7):9-16.
- [5] 薛颠.象形拳法真诠[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 [6] 邱丕相.中国武术文化散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7.
- [7] 孙剑云.孙禄堂武学录[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1.
- [8] 武占江.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形成及特点[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157.
- [9] 李春青.在“体认”与“默会”之间——论中西文论思维方式的差异与趋同[J].社会科学战线,2017(1): 117-134.
- [10] 刘宏亮.体认:中华武术走出视觉文化时代之困境的出路[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9,36(4): 464-468.
- [11] 陈永杰.熊十力的哲学方法论考察[J].理论探讨,2009(5): 167-169.
- [12] 梁冲焱,王攀峰,刘定一,等.王阳明心学知行合一观对明清武术理论的影响[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6,28(3): 235-239.
- [13]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陈明,注释.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
- [14] 张峰.象形武术·身体·思维符号[J].体育与科学,2010,31(1): 48-51.
- [15] 孙喜艳.论“立象以尽意”的言说方式及其美学意义[J].周易研究,2014(6): 81-87.
- [16] 乔凤杰.文化符号:武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216.
- [17] 乔玉成.象思维: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方法学之维[J].中国体育科技,2014,50(5): 3-11.
- [18] 闫民,邱丕相.象形武术——一种用身体表达的动态文化符号[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7(4): 48-52.
- [19] 张树业.“立象尽意”与中国哲学的言说传统[J].学术论坛,2008(10): 22-25.
- [20] 余卫国.《庄子》“言意之辩”的本体论视阈和诠释学维度及其意义[J].社会科学研究,2009(1): 108-114.
- [21] 汪振军.“言”、“意”、“象”:从表意到审美[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151-154.
- [22] 李圣,虞定海.太极拳象形取意的隐喻认知[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6,40(3): 73-79.
- [23] 王树人.中国哲学与文化之根——“象”与“象思维”引论[J].河北学刊,2007(5): 21-25.
- [24] 王涛.“立象尽意”与中国文化的诗性特征[J].天府新论,2012(1): 120-125.
- [25] 吴松,王岗,张君贤.武术意象:一种典型的艺术化物象——对中国武术艺术理论的初探[J].体育科学,2012,32(5): 87-91.
- [26] 董春.论王弼“得象忘言、得意忘象”的易学诠释路径[J].周易研究,2016(3): 44-50.
- [27] 郭象.庄子注疏(成玄英,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28] 王弼.周易注疏(韩康伯,孔颖达,注疏)[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 [29] 张道鑫,王岗.论中国武术的“意”[J].体育学刊,2018,25(1): 28-33.
- [30] 李煌明.意-象-言:意象哲学简论[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6(5): 33-43.
- [31] 尉利工.论意、象、言的诠释学意蕴[J].安徽大学学报,2006(6): 24-28.
- [32] 曹志清.形意拳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9.

Pictographical Interpretation: The Thinking Mode and Operating Logic of Chinese Wushu

HAN Xiaoming¹, HU Xiaofei², QIAO Fengjie¹

(1. 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Chinese Wushu College,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inking pattern of pictographical interpretation is not only a tracing of the origin of Chinese Wushu culture, but also a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its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Using literature, expert interviews, logical analysi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operating logic of the Chinese Wushu pictographical acquisition thinking pattern. It is thought that the pictogra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Wushu is both a holistic way of thinking pattern of ‘the unity of nature and human’ and an intuitive recognition process of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Its operating logic is based on the logical origin of observing objects and capturing images ‘expression of ideas by images’ as the communication bond, and ‘forgetting the images after the attainment of the ideas’ as the ultimate pursuit. Both form a complete process of continuity and connection with each other. The thinking pattern of pictographical interpretation inherent in Chinese Wushu has exerted a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naming of movements, the formation of Wushu sorts, the innovation of techniques, the evolution of styles and the creation of culture.

Key words: pictographical interpretation; Chinese Wushu; thinking pattern; cultural connotation; operating logic